

珠崖故影

90年前发现珍稀濒危五针松 德国林学家结缘海南木

海南日报全媒体记者 陈耿



上个世纪，德国林学家戈特里布·芬次尔(Gottlieb Fenzel, 1896年—1936年)受邀来到中国，在华南、东南、东北和西北地区从事科考、教育和行政管理工作，对我国近代林业建设和教育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最后病逝于中国，葬在陕西西安。

1920年代后期和1930年代初，芬次尔至少两次来到海南岛从事林学科研调查和进行文献资料查考，完成和发表了一篇题为Die Insel Hainan(《海南岛》)的学术论文，论文的一些内容还被当时的同济大学人类学教授、德国人类学家汉斯·史图博(Hans Stübel, 1885年—1961年)的著作《海南岛黎族》(Die Li-Stämme der Insel Hainan)所援引。2023年，记者在柏林工作的朋友前往当地图书馆，翻拍了这篇150多页的论文(相当于一本书的体量)，令人感到震撼的是，论文末页为一张手绘的海南岛地图。

芬次尔的墓碑。资料图

根据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高级工程师王希群先生整理、发表的《德国籍林学家戈特里布·芬次尔年谱》可知，1927年2月，应中山大学委员会之聘，德国明星大学(即慕尼黑大学)林学院在读博士生芬次尔第一次来华，担任该大学农科林学系教授，12月曾与中山大学植物系教授陈焕镛一起前往广东北江和南雄一带调查植物资源；次年12月28日“广东省森林局”成立后，他被任命为副局长。

芬次尔第一次到海南岛从事科研工作，是在1929年的7月至8月，当时主要开展海南岛地质和植被调查。

1930年9月，芬次尔著、齐敬鑫(1900年—1973年)译的《海南岛植物地理考察记》刊载于当时的《农声》杂志第137期，不久后，芬次尔回国为父奔丧；10月，《海南岛植物地理考察记》的续篇发表于《农声》第138期。也是在这一年，芬次尔推荐自己的助教、精通德、英等语种的齐敬鑫获得公费赴德留学，进入明星大学攻读森林科学博士学位。齐敬鑫(后改名为齐坚如)1933年学成归国后，也成为我国著名的林学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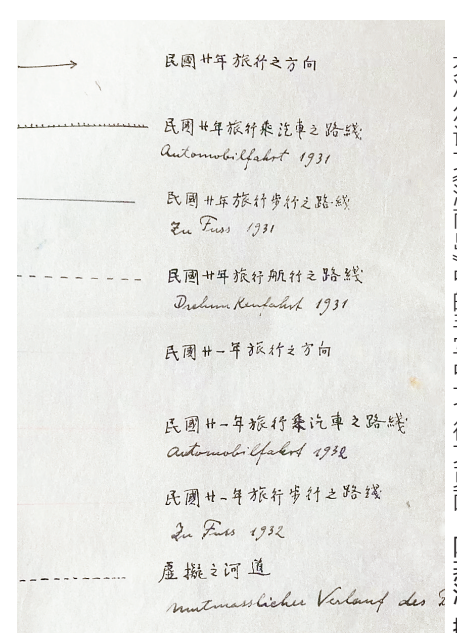
1931年，芬次尔回到明星大学，继续攻读博士学位。也是在那一年，奥地利著名植物学家海因里希·冯亨德尔·马志尼韩马迪(1882年—1940年)，将芬次尔在海南岛采集到的一种松树标本，用芬次尔和自己的姓氏命名了“海南五针松”，拉丁学名为Pinnus Fenzeliana Hand-Mazz，英文名为Fenzel Pine，名称中都有芬次尔的姓氏信息。

据《中国植物志》等中文植物学文献资料介绍，海南五针松是松科松属的植物，别名为菱花松、海南松、粤松和芬次尔松等，为中国的特有植物，国家二级保护野生植物，属于珍稀濒危物种，主要分布在中国大陆的广西、海南等地，生长于海拔1,000米至1,600米的地区，一般生于石边、山坡、山脊上，或散生于石灰岩山坡的马尾松林中，目前已由人工引种栽培。

据《德国籍林学家戈特里布·芬次尔年谱》介绍，1932年7月，芬次尔在德国巴伐利亚罗特阿姆小镇居住，潜心将在海南岛的调查成果《海南岛的地质》写成博士论文，获得博士学位。这一年10月，他接到中国方面的再次邀请之后，又踏上入华的旅途。

此后，芬次尔的工作区域主要在西北地区，当过1934年10月设置的“陕西省林务局”顾问、副局长，参与采集植物标本；他也曾踏足我国的东北和东南地区，研究成果非常丰富，内容也涵盖到海南岛。

芬次尔很善于发现和举荐我国本土林业人才。除了齐敬鑫，1931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的陕西榆林人白



芬次尔论文《海南岛》中的手写中文、德文页面。陈燕清摄



笔直挺拔的海南五针松大树。占刚摄于鹦哥岭

萌元(1905年—1967年)，1935年2月至4月受芬次尔邀请，以西北农林专科学校教师的身份，一起在陕西、甘肃、青海、宁夏等地调查森林资源和采集植物标本。此后，芬次尔向“陕西省政府”推荐白萌元到德国明星大学留学深造，白萌元于1936年赴德深造林学，3年后获得森林学博士学位回国。

王希群先生告诉记者：“现在我国各地的植物标本馆保存有芬次尔在陕、甘、青、宁采集的植物标本共394号(份)，仅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植物标本馆保存有芬次尔等人1934年采集的植物标本70号(份)。”

1933年，芬次尔的学术论文Die Insel Hainan(《海南岛》)发表在德国地理杂志Petermanns Geographische Mitteilungen(《彼得曼地理信息》)的第26卷上。这篇论文有个很长的副题，直译过来意为“基于观察和文献的区域研究概览”。

几年前，王希群先生托人从德国购买到了这期杂志的原本，目前正着手将芬次尔的这篇论文翻译为中文。

1936年8月，为了筹办关山林场，芬次尔冒着盛夏的酷暑前往陇县考察，回到西安时已感到身心不适，但他仍抱病工作，由于操劳过度，严重失眠，头痛难忍，于8月14日在西安病逝，葬在西安莲湖公园。芬次尔病故时年仅40岁，终生未婚。书法家沙孟海受“陕西省政府主席”邵力子邀请，用东汉文学家蔡邕的笔调，撰述并书写了《陕西省林务局副局长芬次尔君墓碣铭》。



海南五针松的树叶和果实。占刚摄于鹦哥岭

克制美学的永恒春意

■ 子安

作为“明四家”中唯一跨越成化至嘉靖五朝的艺术大家，文徵明的创作历程恰似一部活的明代艺术断代史，其独创的“细文”画风在《白玉兰图》中臻至化境——看似随性的折枝构图中暗藏黄金分割，淡雅渲染的花瓣里藏着十三层墨色叠加。

美术史学家高居翰曾指出，这种“以书入画”的笔法革新，实则是将赵孟頫倡导的“书画同源”理论推向新的维度。画面右侧那截苍劲的老枝，转折处分明可见《黄庭经》小楷的笔意；而花瓣边缘的微妙枯笔，则暗合怀素草书的气韵流转。

相较于沈周浑厚的设色风格，文徵明在《白玉兰图》中展现出令人惊叹的克制美学。通过显微颜料分析可知，画面中所谓“淡红”实为朱砂经七日出露研磨后的极致稀释，这种将矿物颜料处理出水墨效果的技术，至今仍令修复师叹为观止。

故宫博物院研究员杨丹霞认为，这种“五色令人盲”的返璞选择，暗合着道家“见素抱朴”的思想精髓——画家以99.7%的留白构建出“空”的场域，却在0.3%的着墨处引爆了整个春天的能量。

玉兰在明代文人体系中具有特殊象征意义，其“望春而发，遇寒不凋”的特性，恰是儒家“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理想投射。文徵明八次会试不第的人生经历，赋予这株玉兰超越植物学的精神维度：那些向上舒展的枝条，既是对科举沉浮的淡然，亦是对艺术真谛的坚守。比较研究显示，此作与达·芬奇同期创作的《百合花》形成奇妙呼应——两位大师不约而同地选择单体花卉作为精神载体，却在东方“写意”与西方“写实”的差异中，揭示了人类对永恒之美的共同追寻。

当数字影像技术将《白玉兰图》放大至纳米级别，我们惊觉每片花瓣的墨迹浸润都精确对应着宣纸纤维的走向——这种对材料物性的绝对尊重，恰与当代生态艺术形成跨越时空的共鸣。中央美院实验艺术学院院长邱志杰曾说，文徵明在创作中展现的“物我相忘”状态，为当今过度依赖技术的艺术创作提供了重要反思：在VR与AI重构视觉体验的今天，我们是否还记得如何用一支毛笔与自然进行最本真的对话？

《白玉兰图》这幅纵28.3厘米、横58.7厘米的绢本立轴，在5个世纪的流转中持续释放着惊人的美学能量。从晚明董其昌的“南北宗论”到近代黄宾虹的“五笔七墨”，历代大师都能在这树玉兰中找到新的启示。这或许就是文徵明留给后世最珍贵的礼物——在永不停歇的时间长河里，真正的艺术永远是最早报春的那树玉兰。



文徵明《白玉兰图》。美国大都会博物馆藏

笔砚清玩

每年2月至5月，是我国白玉兰的花期。在明代嘉靖二十四年(1545年)的春日，姑苏城外的玉兰树下，一位白发老者正以颤抖却坚定的笔触捕捉着枝头初绽的芳华。这幅最终定格的《白玉兰图》，不仅是文徵明艺术生涯的巅峰凝萃，更成为东方美学中“物我合一”境界的永恒见证。当我们以当代视角重新审视这幅四五百年前的墨韵遗珍，会发现其承载的不仅是文人画的技法精髓，更是一部关于生命哲学的视觉诗篇。

儋州蛇谚

■ 林成玲

2025年是乙巳蛇年。蛇作为十二生肖之一，在民间有着其独特的地位，海南儋州百姓对蛇的想象是光怪陆离的，关于蛇的民间故事和谚语，反映了人性的复杂与生存的哲理。

《山海经·海内南经》中有巴蛇吞象的故事，屈原《天问》中也有“灵蛇吞象，厥大何如”的句子。后世百姓根据传说改编成了“蛇吞象”的民间故事。在儋州地区，也用“人心不足蛇吞象，当皇又想做仙人”的谚语来形容人心不足，贪得无厌。

而“嘴甜像蜜糖，心毒如蛇蝎”“毒蛇装美女，恶鬼扮慈神”“毒蛇外面软，里面毒”，是儋州先民对蛇的另一面毫不留情的揭露。蜜糖和美女本是令人心驰神往的，但揭开伪装的面具就会发现其腐败的内里。

“打蛇打七寸”是国人皆知的说法，在儋州地区，还有“打蛇要打头，斩草要除根”的谚语，提醒人们直面问题时需要清醒和果决。

“打蛇不死千年记”“打蛇不死恨三年”则是用蛇代指具有危害性的事物或敌人，警戒人们除恶务尽。同时这也是对半途而废的批判。儋州民间谚语中有“毒蛇会脱皮，但绝不改变它的性格”“蛇化为龙，不变其鳞”等，告诫后代，蛇的毒牙不会因表象更迭而改变，但也是在劝诫后辈，有志者，事竟成。

《荀子·劝学》中有“螣蛇无足而飞，梧鼠五技而穷”之句，以螣蛇无腿却有飞行能力来比喻用心专一，必能成功。在儋州，则有“蛇不生根行千里”的谚语，借此来勉励晚辈不要妄自菲薄，因为天道酬勤。

“蛇有蛇路，鼠有鼠途”“蛇而着追蛇路去，蜥而着追蜥路行”(蜥在儋州话中指蜈蚣)等谚语，则展现了蛇以其蜿蜒曲折的方式行进，老鼠和蜈蚣凭借着其机敏灵活穿梭于各种缝隙之中，喻示不同的人在处理事务、解决问题时，都有各自独特的方法和途径。

儋州蛇谚的最精妙之处，在于其矛盾的统一性。“救蛤生怕蛇吃肚，不救亦愁蛇吃蛤”“救得蛇生蛤又死”“着得哥心失嫂意，救得蛤生蛇吃肚”(蛤在儋州话等方言中指蛙)，蛇以蛙为食，而先民通过对蛇和蛙关系的观察而创造的谚语，反映了动态平衡的生态哲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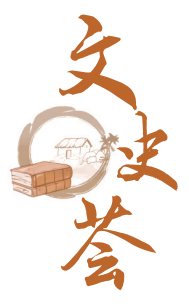
儋州地区还流传着“惊蛇怕鱼鳞”“经过蛇咬怕蚯蚓”的谚语，展示了人类被蛇伤害之后的条件反射，这种草木皆兵的应激反应是对创伤记忆的噩梦，至今仍常用于提醒人们在面对危险和未知时，须保持谨慎和警惕。

这样看来，蛇的运气不是很好，因为在儋州先民的心目中，大多对蛇没有什么好印象，人文多是贬损。然而，与纯粹的恐惧不同，在更早的时候，蛇也是吉祥的预示。《诗经》中有“维虺维蛇，女子之祥”，将梦中出现蛇作为生女的吉兆。在儋州，梦见蛇则表示发梦者为有福之人，冥冥之中有神灵保佑，是大吉之兆。

儋州蛇谚中还有一句“人老人而死，蛇老蛇换鳞”，随着蛇的生长，旧皮无法容纳成长的鳞片，所以蛇一般每两三个月就蜕皮一次。在蜕皮过程中，蛇的新鳞片逐渐长出并取代旧鳞片。每一次蜕皮都是摆脱旧躯壳，获得新生的过程，生命得到了延续和再生。这种对生命循环和不朽的期待大概也是蛇被列入十二生肖的原因之一吧。

此外，儋州民俗文学中有关蛇的故事不胜枚举。贪得无厌、罔顾伦理、心怀不轨的恶人们会在他们所渴望的财宝盒中发现毒蛇。于是，一提起蛇，畏惧就随之而来。因为传说中蛇的能力是如此神秘，如此强大，被它惩罚的人下场是如此惨烈，让大众不由自主地心生畏惧。

儋州民间还流传着大蛇解救有生命之危的过路农夫，后农夫为报大蛇之恩将三女儿嫁给大蛇的故事。可见，蛇既是赐福降瑞的守护神，也是杀绝果斯的刽子手。



投稿邮箱 382552910@qq.com